

● 教育学

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的集约化初探

桂 国 平

(武汉大学 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桂国平(1953-),男,湖北蕲春人,武汉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主要从事 MBA 专业英语、金融与投资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

[摘 要] 长期以来,我国对专业外语的忽视,使得外语教育形成了起点与终点基本均为公共外语的这种粗放的教育模式,教育目的主要是为了应试而非国际竞争与交流。从外语教育的最终目的来看,在高级公共外语基础上乘势继续专业外语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外语教育集约化问题。就目前而言,培养合格的专业外语的师资不是技术问题,它需要高校前瞻性认识及优惠的政策。

[关键词] 外语教育体系;集约型教育;粗放型教育;公共外语;专业外语

[中图分类号] G 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2-0277-04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语教学的确存在投入较多,产出较低的‘浪费现象’”^[1],面临如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外语粗放式、应试型教育向集约化、素质型过渡的问题。然而,如果不弄清目前我国外语教学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究竟到了何种地步,特别是缘何造成如此浪费,我们就不会痛下决心在我国建立一种高效、合理、集约化的外语教育体系。

一、粗放的中国外语教育:投入产出比太低

如果我们把教育视作一种产业,我国的外语教育可以用“粗放型”三个字来概括。粗放表现为低效与浪费,或曰投入产出比低。谈到我国外语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人们倾向于从个人学习外语效率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比如说我国学生在初、高中总共才学 2000 个左右的单词,即一个学时仅学 1 个简单的单词;大学生一个学时约学 7.11 个单词,这种大纲安排欠科学性,无疑导致时间和精力上的巨大浪费。

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国家外语教育目的的高度,特别是根据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国际竞争的特点来审视当今我国的外语教育体系及效率,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浪费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本来,国家对国民外语强制性的要求,旨在使受教育者能以

外语为工具,自如地参与各种国际竞争与交流。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极大提高,外语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是,其投入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换言之,我国外语教育的浪费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据权威统计,“我们的基础外语教育,五六千万人在学外语……”^[1]。在城市,从小学三年级至博士阶段均开设外语课程,这是任何其他一门课无法比的。但不容讳言,绝大多数人学外语只不过是应付这样那样的考试。

外语对我国在国际竞争与交流的贡献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国家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岑建君曾尖锐地指出:“由于我们外语水平比较差,在经济方面吃亏的例子是很多的。”^[2]。笔者 20 世纪 80 年代曾在海外长期担任国际经济合作英语翻译,归国后先后从事大学公共英语、MBA 和本科专业英语教学,对上述看法的感受尤为痛切。

众所周知,国际经济合作是以竞争为前提,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说到我国的资源优势,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说是劳动力成本低。而说到国际经济合作,鉴于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许多学者认为“所谓狭义的国际经济合作则特指国际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两项具体方式。”^[3](第 36 页)然而,由于

普遍的语言障碍,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规模和层次上长期严重受阻。只要看看我国国际工程承包的实绩及国际工程承包的竞争“游戏规则”,人们就会了解外语制约我国资源优势的发挥已到了何等令人痛心的程度。

与韩国相比,我国承包业进入国际市场仅晚 4 年,而韩国早在 1982 年以 520 亿美元的年合同额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程承包商。研究招标投标的学者余杭教授曾指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南朝鲜(即韩国)就是靠劳务输出起家,它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劳务承包,而我国劳务成本并不比他们高,为什么竞争不过他们?”^[4](第 67 页)是的,我国建设业从业人员近 3000 万之众,劳动力成本极低,1997 年海外工程承包公司的数量 26 个,仅次于美国(65 个),但美国当年海外承包营业额为 245.54 亿美元,占其总营业额的 22.3%。同期我国海外公司共完成营业额仅 40.79 亿美元,占这些公司总营业额的 3.7%。

事实上,海外工程营业额主要来自两类承包合同:一是包括项目设计和监理的工程咨询服务合同;二是工程施工合同。前者属知识集约型的服务贸易,其资源投入不多,风险不大,但收入丰厚而稳定,通常可达项目投资的 5% 左右;后者虽资源投入和风险要大许多倍,但其利润之低,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专业外语的障碍,我国迄今基本上被排斥在前者这种知识密集型的竞争之外。国际工程咨询服务合同的竞争普遍采用陈述(Presentations)与面试(Interviews)。世界银行工程项目高级顾问鲁卡司博士(C. L. Lucas)惊叹:“我们已进入了一个面试与舞台陈述的时代。[The time of interview and staged presentation is upon us.]”^[5](第 106 页)面试需专业外语自不待说,陈述有“陈”和“述”两层含意。“陈”指用包括多媒体在内的高技术手段,将未来项目的各种视图向专家评委陈列;“述”则是竞争者口头表达其对项目业主各种需求的理解及在设计中如何体现对这些需求的满足。从心理和策略上讲,竞争者至少也要用非常地道的专业英语。但是,国际上项目设计包括工程、技术、财务、法律、管理、行政等方面的广义的招标文件而不只是狭义的工程图纸的设计;陈述(包括答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不得随带翻译。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能成功地应付这种场面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这就是为何到 1997 年我国虽有工程咨询实体 11000 家,从业者达 74 万之众,而当年完成国际合同额仅为 1.38 亿美元。

可以说,语言的困扰迄今使我国国际经济合作

几乎都局限于投入大、风险大、竞争激烈、回报低的工程施工承包这种粗放的经营层次上。就是在这个层次上,外语水平的困扰同样使我国专业人员陷入被动。按说,在国际工程投标中,投标人除对所有招标文件透彻地理解外,还要对项目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市场进行深入的调查。国际上工程项目的招标文件包括图纸、技术规范、工程量表和承包条件 4 大块,涉及工程、技术、工艺、材料、财务、法律、管理、行政、习俗等方面数以千页计的专业文件。招标与投标之间的时间有严格规定。许多项目业主在“投标人须知”中明文规定,“承包商项目经理不得随带翻译”。原因是,项目中标与签订合同间承包商须与业主进行反复的谈判;长期的施工中,他每天须与业主工程师沟通。由于英语的困扰,我国施工企业往往因找不到这样的项目经理而被排斥在竞争之外。即便没有这条要求,由于我国大多数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不太精通英语,而翻译又不精通工程与管理,他们往往吃不透招标文件,更谈不上能在投标前进行有效的市场调研。因而,盲目报价在中国公司屡见不鲜。1984 年笔者亲见,一家中国公司在约旦马安省一女子职业学校项目多功能大厅地面工程的报价中,由于看不懂技术规范中“Brownwood”这个专业术语,同时又未进行市场调研而主观报价,结果每平方米亏近十倍。

二、公共外语与专业外语比例:结构严重失衡

我国基础教育中有五六千万人组成的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学外语大军,中国人在美国的 TOEFL、GRE 和 GMAT 这类英语考试中得分之高令全球瞩目。然而,中国人却因语言障碍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严重受阻,当今我国的外语教育成了一种真正粗放的“应试教育”。这究竟作何解释呢?主要原因之一是,专业外语在我国外语教育体系中的权重与公共外语比起来,已到了几乎可忽略不计的地位。我国 1987 年就开始实行全国大学英语(CET)四、六级统考,其通过率被认为代表一个学校外语教育水平与形象,这使得高校几乎将所有外语教育资源投入到以大学英语四、六级为代表的公共外语教学之中。以我校为例,专业外语和公共外语教师比率约在 1:12,在笔者所在的一个涉外专业,专业外语和公共英语课时比率为 1:8。在我国高校中,这绝非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使得我国的外语教育形成了起点与终点均为公共外语这一不正常的现象。

客观地讲,一个完善的外语教育体系应包括初中、高级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在我国,假使我们承

认外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参与国际竞争与交流而不只是应付考试,我们就必须承认外语是分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的,必须承认外语教育的目的最终只能通过专业外语来实现,必须承认,即便大学六级、硕士生、博士生英语叫高级英语,也只能属公共外语。所谓专业外语,是指一种以中、高级公共外语为基础,与一门专业高度结合,使该专业人员能以外语为工具,在国际范围自如地从事其专业活动的外语。总之,公共外语是专业外语的基础,专业外语则是公共外语的发展。两者既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相互排斥。一旦这些教育规律被忽视,我们得为之付出代价。

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两者的作用及关系有如铁与钢。铁是钢之本,但这并不能说明有了铁自然就有了钢。钢,特别是某些特种钢的作用绝非廉价的铁所能替代。铁欲成钢须经进一步地冶炼。没有这样一个过程,铁永远是铁。现代冶金工业较过去效率更高在于:人们将生铁水不待其冷却就直接送进炼钢炉炼钢。因为,一旦等到铁水冷却,以后再将其加热到熔点来炼钢,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国外语教育之所以是粗放的,浪费惊人,说到底就是我们未能在公共外语教育的基础上乘势进行专业外语教育,如同大量的铁水没有马上送入炼钢炉而就此冷却:几千万人学外语,绝大部分高校未能在大学阶段后期开出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外语,这使得我国外语教育几乎完全局限在公共外语范围,基本上服务于应试的目的。难怪著名英语专家杨治中教授疾呼“要提倡持续性外语教育”^[6]。

沸腾的生铁水直接进入炼钢炉炼钢能极大地降耗;如果在高级公共外语基础上不间断地施以专业外语,人们完全能高效地掌握用来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与交流的专业外语。可是,就是这样一件本来并不难做的事,我们却没有去作,就像是辛辛苦苦地将矿石炼成了生铁水却没有马上将其送进炼钢炉进一步冶炼,而就此停下来,我们得到的全是生铁。从语言学习规律角度讲,我们浪费了高效率掌握专业外语的两个决定性条件:一是学习的动力,一是语言的基础。众所周知,人们只有在感到学习是一种自身的需要时,对学习才感兴趣,学习效率才高。实践证明,学生感到专业外语能把他们专业活动由“national”(国内的)升华至“international”(国际的),因而亢奋,学得进,记得牢。再者,在中、高级公共外语基础上学专业外语,远不像学习基础外语那么困难。相反,专业外语是最经济地利用公共外语的知识资源,因为专业外语中大多数听似特别专业的术语,其

实大多是公共外语中一些极常见的词。例如,国际金融中的“挤兑”(run),证券投资中的“空头交易人”(short trader),建筑工程中的“踢脚线”(skirt)等,就单词而言,它们都是初中就学过的,并不需重新学,只需理解它们的专业语境中的意思即可。

三、外语集约化教育的出路: 对专业外语进行政策扶持

专业英语薄弱,使得我国外语教育一直处于一种粗放的状态,这种状态已经严重制约我国国际竞争的广度与深度。根据目前我国外语教育体系的状况——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比例严重失衡,特别是专业外语仍普遍受到忽视,随着以知识创新、信息共享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将继续付出代价。

应该说,在我国建设一支有质量、有规模的专业外语教师队伍的确不容易。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其说是一个技术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策问题,即这一问题的症结不在专业外语本身的难度而在各高校对专业外语的认识及对专业英语教师政策是否客观。如果说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工厂,专业英语则是一道使产品品质升华的特殊工序。我国高校的课型大致可分为包括公共外语在内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专业外语课这四类。由于从事第四类教育者寡,他们往往处于学校政策的“夹缝”之中,他们的贡献很难得到充分肯定,都有看不到隧道尽头的曙光的感觉。因而,其队伍稳定及业务钻研也就缺乏起码的动力,这样规模和素质的专业外语师资队伍自然难以开出有实际意义的专业外语课程。

严格地讲,有实际意义的专业外语是指其教师既有扎实的外语功底又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其必须能以外语为工具与国际同行自如地进行口、笔头交流而不只是能看懂专业资料。较理想的是,专业外语应由学外语出身的、进行过有关的专业学习或在海外获得专业学位的教师来讲授。但由于我国高校普遍缺乏鼓励这种特殊人才培养的机制与氛围,这两类人才一般都不大愿从事专业英语的教学。据对我校1975级以来外语系列留校教师的调查,学外语出身改行其他专业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其他专业的博士、教授、博导乃至院级业务领导,很多外语“改行者”借助于外语的优势在其他领域达到了比“专业出身者”更高的高度,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与“改行者”资历相等而未改行者,则在外语系列基本都是副教授。此外,调查还表明,“改行者”中无一从事专业外语教学。这些现象说明两个简单的事实:其一,

外语是一个人事业的助推器。其二,外语教师不如专业教师那样被人看好。后者是导致高校的非外语专业外语教师队伍人心不稳、素质不高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只要高校以合理的政策鼓励外语院系和其他院系共同培养教师,问题不难解决。无论从长远还是从当前来看,以下两种途径均具操作性:一是在职称评定或业绩考核中以较合理的政策鼓励上述两类人才献身于专业外语教学;二是有关的院系请社会上长期在国际上从事专业活动的专家和翻译兼职授课,因为这些人一般是学专业或英语出身,往往精专业,通外语,同时又有在国际上长期从事专业活动的经验。

当今,我国的一些高校,特别是那些重点高校应认识到,当前以忽视专业外语为特征的粗放型外语教育已成为制约我国专业人员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流的瓶颈。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高校的前瞻性认识与政策。只要我们对本文中所述的问题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并以积极的政策扶持专业外语,就有可

能在我国建立一个既有公共外语又有专业外语的一体化、集约化的、完全适应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流的全新的外语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将极大地加速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进程。

[参 考 文 献]

- [1] 包天仁. 找出弊端, 杜绝“少慢差费”[N]. 光明日报, 1998-11-25.
- [2] 岑建君. 提高外语水平, 迎接 21 世纪[N]. 光明日报, 1998-11-25.
- [3] 储祥银. 国际经济合作原理[M]. 北京: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93.
- [4] 余 杭. 招标投标通论[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 [5] CHESTER L, LUCAS P E.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Business Management [M].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rporation. 1986.
- [6] 杨治中. 要提倡持续性外语教育[N]. 光明日报, 1998-11-25.

China's Intensive Educ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 Guo-ping

(Wuh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GUI Guo-ping (1953-),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majoring in teaching and studying business English for MBA and undergraduates.

Abstract: China's chronic negligence of SFL (specialized foreign languages) reduces the nation's FL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o such a extensive pattern that both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FLT are general English, FLT aims at exams th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ex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ltimate end of China's FLT, the nation's intensive FLT can be thoroughly achieved once SFL is taught soon after the advanced general English teaching is over. The present problem is not a technical knot. The remedy for it requires both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insight into the issue and their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ward SFL instructors.

Key words: FL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ystem; intensive education; extensive education; general foreign languages; SFL (specialized foreign languages)